

制度逻辑理论与中国实践：对创业研究的启示^{*}

□ 郝 斌

摘 要：尽管不少学者将制度逻辑理论引入中国管理问题研究中，但主要是运用该理论解释中国现象，对中国情境如何塑造不同层面制度逻辑的研究比较缺乏。本文在回顾基于我国情境所开展的制度逻辑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创业实践中的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进行进一步阐释，认为我国的国家逻辑在合法性和认同来源、注意力基础和战略基础上区别于其他国家，而我国市场逻辑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市场资源利用与配置中的“协调有序性”，包括国有资本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协调作用以及产业园区的产业链整合角色等。本文进一步从制度逻辑变迁、多级行政体系、多重制度逻辑三个方面对我国的创业研究问题进行了剖析。基于制度逻辑的创业研究需要关注我国市场中独特的行业属性、区域属性和社会属性，讲好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案例和故事，以期形成中国情境下的制度逻辑与创业理论。

关键词：制度逻辑；中国情境；创业

制度逻辑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备受关注，并在 20 多年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根据 Haveman 和 Gualtieri (2017) 的定义，制度逻辑是“个人、团队和组织用以评价它们的日常活动，为这些活动赋予意义，并在时间和空间上组织这些活动的文化要素系统”。制度逻辑是一种文化要素系统，包含了价值观、信仰、规范期望等文化要素，并且这些要素之间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一个具有高度一致性和逻辑性的系统 (Thronton et al., 2012)。个体、团队和组织基于制度逻辑来评价它们的日常行为，并为它们的行为赋予特定意义。在评价和意义赋予的同时，个体、团队和组织也会基于制度逻辑对包括组织结构、程序、非正式文化以及权力分配等在内的活动进行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新创企业追逐技术潮流对创业成功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2274061）资助。笔者感谢顾问主编李海洋老师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时间和空间上的组织。制度逻辑并不仅是一个社会层面的现象，也会体现在行业、组织以及组织间等不同层面。制度逻辑的这种跨层次性极大地提升了其理论解释力，也为相关主体（如企业组织）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开展的社会建构奠定了基础。

在创业与战略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制度逻辑理论引入对我国企业研究中，试图基于这一理论解释我国的创业与战略实践（Chen, 2020; Genin et al., 2021; Xing et al., 2020; 陈晋等, 2021）。不过，主流文献主要基于已有理论框架来解释我国企业的战略行为，较少从我国特有的制度情境出发，探究中国企业的制度逻辑 [少数例外，如 Greve & Zhang (2017)]。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本土化管理实践不断推进。特别是在当前新兴领域不断涌现、创业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探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国家和市场制度逻辑，并基于此来剖析中国的创业行为和新创企业战略，无疑是一个亟待破解的课题。本文首先回顾基于我国情境开展制度逻辑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而结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创业实践中的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进行分析。最后从创业视角探讨中国企业制度逻辑下的新创企业战略问题。

一、基于我国情境的制度逻辑研究回顾

制度逻辑的提出及其理论发展主要建立在西方现代化及其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近些年来，不少文献也开始关注到我国情境下的制度

逻辑问题，试图用现有的制度逻辑理论来解释我国的管理现象。部分学者从单一制度逻辑的视角出发，关注企业在经营中如何受到制度逻辑的影响。Genin 等（2021）以中国高速铁路行业中的国有企业重组和制度逻辑不协调为例，研究了新兴经济体中的国家治理和技术创新。他们的研究发现，国家治理和制度逻辑存在不协调的现象，这给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了挑战。在另一篇有关国有企业制度逻辑的研究中，Chen（2020）发现国有企业的身份认同与制度逻辑密切相关，并进而对关系行为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国有企业的身份认同强调企业为国家服务的角色，因此管理者的关系行为更倾向于满足国家利益，导致国有企业更倾向于与政府官员和其他国有企业进行合作。另一些学者则关注到了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解释跨国公司如何在特定制度逻辑影响下开展经营。Tan 和 Wang（2011）发现跨国公司在道德压力下的战略反应受到其所处的不同制度逻辑影响，包括母公司及其子公司所处环境中的制度逻辑。他们提出，制度逻辑的影响使跨国公司需要在策略制定过程中平衡道德压力和商业利益。Zhang 和 Luo（2013）通过对全球多个跨国公司的案例研究，探讨了企业在新兴市场中面临的组织脆弱性和制度逻辑的挑战，发现制度逻辑会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如当地政府的期望、行业标准、社会公众的关注等。除了国有企业和国外跨国公司，家族企业的制度逻辑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例如，Xu 等（2019）运用了制度逻辑的视角分析了受家族控制的我国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和职业经理人使用情况。他们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家族控制对于高管团

队中职业经理人的使用具有显著影响。然而，在不同的制度逻辑影响下，家族控制和职业经理人使用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在竞争逻辑主导的制度环境中，家族控制与职业经理人使用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在协作逻辑主导的制度环境中呈正相关关系。

在很多情况下，企业可能同时受到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Xing 等（2020）研究了外国医院在中国进入模式选择与制度逻辑的关系，发现外国医院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必须应对不同的制度逻辑挑战，包括中国的医疗监管机构、国有医院的强势地位、市场竞争以及社会预期等。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外国医院采取了多种策略，如与当地医院合作、积极应对政府监管、进行本地化管理、提供高质量服务等。Zhou 等（2017）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与产品创新之间的关系同时受到制度逻辑和效率逻辑的影响。他们提出，国有企业的制度逻辑支持创新，但效率逻辑则对其产生限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与产品创新呈现倒“U”形关系，即在中间水平时，国有企业的产品创新最为活跃。Tang（2019）关注到了国有企业同时受到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双重影响。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 FDI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国有企业 FDI 扩张速度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拥有政府支持和资源优势。然而，在市场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有企业 FDI 扩张速度受到了一定限制，因为市场力量更加强大。Yiu 等（2014）研究了我国商业集团中的制度逻辑对战略创业的影响。他们发现，商业集团的战略创业受到两种制度逻辑的影响，即传统家族

控制逻辑和现代公司逻辑。在家族企业中，家族控制逻辑是主导制度逻辑，并且会阻碍企业进行战略创业；而在上市公司中，主导逻辑为公众公司逻辑，并且有助于企业进行战略创业。

由于多重逻辑的存在，不同逻辑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策略进一步吸引了学者的关注。在中国情境下，学者们格外关注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He 等（2020）的研究关注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在企业内外部的共存如何影响企业战略。以中国信托业为背景，该研究认为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在不同层次上运作并相互作用，影响了信托公司的金融组合多样化。通过其资源配置和治理机制，金融中介机构中的国有控股对金融组合多样化产生非线性影响，因为它在企业内平衡了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这种影响取决于制度转型的背景，即市场逻辑的普及程度减弱了国家控制对金融组合多样化的影响（通过发展市场制度），而监管限制作为行业层面上国家逻辑的表现，增强了这一影响（通过纠正市场失灵）。Greve 和 Zhang（2017）通过对 157 家跨国公司的并购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并购决策的背后涉及多重制度逻辑和权力源的互动作用。他们指出，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往往需要平衡不同制度逻辑的要求，并考虑各种权力源的影响，包括市场力量、政府监管、利益相关者、行业标准等。在另一项研究中，Liu 等（2016）通过对中国慈善组织“壹基金”的出现进行分析，发现该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政府、市场和其他慈善组织等不同的制度逻辑挑战。该组织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制度逻辑，树立了自身的社会形象和品牌，并采取创新的融资模式、积极应对市场竞争和与

其他慈善组织合作等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在解决逻辑冲突的策略上，Zhang（2023）基于小企业与大企业合作的实践背景指出，企业必须意识到不同制度逻辑的存在，以协商和整合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并采取创新的方式来创造共同价值。在设计合理的情况下，制度逻辑之间的冲突也可以转化为相互之间的匹配性。Cheng等（2023）讨论了中国吉利汽车公司收购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的案例，探究了在跨境收购中不同制度逻辑的匹配过程。研究发现，在进行跨境收购前，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收购方需要引入多种制度逻辑来应对制度复杂性。同时，在外部制度压力下，收购方需要匹配多种制度逻辑，引入相互兼容性。相互兼容性是预收购阶段开始的标志。随着收购的进行，社会逻辑和商业逻辑需要相互补充，以完成收购的目标。兼容性和互补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商业逻辑和社会逻辑之间的匹配过程，形成协同逻辑。

可以发现，现有我国情境下制度逻辑的研究比较多地停留在理论应用层面，注重以我国实践为情境探究制度逻辑理论问题。然而，考虑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情境下制度逻辑的探讨还需要更多地考虑我们特有的制度逻辑特性。正如 Redding 和 Witt（2015）所揭示的，有关制度逻辑的研究需要更多地考虑本土化问题。制度逻辑理论的本土化不仅模仿西方模式，而且需要充分理解和挖掘本土文化中独特的制度逻辑，以推进本土化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主要结合我国情境下特有的创业现象讨论我国创业实践中的制度逻辑视角。

二、中国创业实践中的国家与市场逻辑

在西方国家，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彼此相互独立，两者之间有着清晰的边界：国家逻辑强调以公共品最大化为战略基础、以政府权威为合法性和认同来源，市场逻辑强调以效率和竞争为战略基础、以声誉和业绩为合法性和认同来源（Thornton et al., 2012）。在我国，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边界融合，具体表现为市场逻辑的合法性来源和认同来源包含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市场逻辑的注意力和战略基础涵盖政策动向和机遇等（Chen et al., 2022; Du & Zhang, 2018）。其中，市场经济中“有为政府”的机制设计让市场逻辑中融入了“国家”元素（陈云贤，2019），也使其具有鲜明“中国特色”。而且，这一边界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推进而发生演变。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调整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调整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也得以共同演进。以下针对我国当前的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进行讨论。

（一）国家逻辑

我国国家逻辑的形成遵循着特定的历史脉络，并与我国的行政体系和经济发展模式紧密关联。一是党的领导构成了国家逻辑的合法性

与认同来源。制度逻辑理论关注国家逻辑的权威来源，党的领导及政策方针也因此构成了我国企业国家逻辑的权威来源。不仅如此，党的领导深入到社会与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党政高度融合使党的历史使命和价值观得以在社会经济管理体现和贯彻（Marquis & Qiao, 2020）。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政府与西方国家政府在行政管理或社会治理上截然不同，需要更好地结合党的使命和价值观来理解各级政府部门行政决策。正是因为党通过使命贯彻来引领行政决策，各级部门在执行国家政策时才有了合法性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整个国家的规范期望和信念得以逐渐形成，与相应的政策实践共同推动着国家逻辑演进。

二是经济发展作为部门决策的注意力与战略基础。尽管经济增长是所有国家决策部门的核心目标，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但我国行政部门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显著高于其他国家，也使我们需区别看待我国社会遵从的国家逻辑。中央决策部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树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各级行政机构和部门无一不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各类政策、各种投资大量集中在经济发展领域，以提高国家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使命。由此，西方制度下国家逻辑中公共品最大化的战略基础在我国情境下需要被赋予新的内涵。一方面，很长时间以来国家发展方针突出收入分配的效率优先原则，强调公共品供给与分配中聚焦国家资源配置效率，这显著区别于西方国家逻辑中单纯以公平为基础的公共品最大化，进而影响

到我国国家逻辑中的战略基础。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政策鼓励先行先试和模式创新（如自贸区发展模式等），允许特定期限内的地区发展差异，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效率作为国家逻辑中战略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地，从国家逻辑的注意力基础角度来看，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方针使各级行政部门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指标，从早期的GDP为引领到如今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均作为行政决策的指引。基于此，创业不再仅是一种简单的市场行为，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属性，成为地方部门推动经济增长的着力点（He et al., 2019）。“创业”这一概念变成地方经济中表征合法性的标签，也由此影响着创业中的资源获取。各级行政部门着力推动的“双创”“大学生创新创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等一系列与创业相关的计划和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些计划在影响创业行为与绩效的同时，也构成了个体投身创业活动的制度情境和合法性来源。

（二）市场逻辑

不同学者对我国市场逻辑中“中国特色”的理解可能不尽相同。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强调市场资源利用与配置中的“协调有序性”。这种“协调有序性”并非通过“计划”来布局商品供给和生产，而是在市场化分工基础上通过调控和有序组织来促进市场发展。“协调”代表了市场发展中的政府角色定位。在排除市场与政府之间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基础上，国家倡导通过市场加政府来完善市场设计的宏观思路（麦克米兰，2006）。在这一设计过程中，市场机制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政府则是通过“有为”来促进资源配置

(陈云贤, 2019), 扮演“协调者”的角色。“有序”代表了市场发展中政府协调的目标定位, 即保障市场机制的有序运行。政府通过构建政策框架和制度体系, 并主导基础产业领域的发展来维系市场的良性运转(胡家勇, 2016), 降低市场失灵的风险。

具体而言, 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协调有序性”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一是通过国有资本的参与来组织和协调市场资源配置。国有经济通过投资拉动效应协调市场资源供给。国有经济一般作为国家政策的风向标, 在很多情况下, 其投资方向代表了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方向(陈晋等, 2021)。通过国有资本的引领, 可以带动大量私有企业共同参与市场竞争, 并共同遵循以效率、竞争和产权为主体的市场逻辑。另外, 国有与私有经济之间通过领域布局差异来协调资源配置, 更好地促进市场有序发展。在我国现行市场环境下, 国有资本并不是遍地开花, 而是集中在少数行业或领域中。这些行业要么涉足国计民生(如水、电等城市基础设施行业), 关乎国家基础安全, 要么需要大量资本和基础技术投入, 有赖于国家的集体力量才能更好地推动其发展。这样的市场布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市场配置有效性, 促进企业开发尖端技术、填补市场空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随着国家经济改革不断推进, 国有经济为主导的行业领域越来越少, 包括金融、能源等领域开始逐步向私有资本开放, 准入门槛越来越低, 为创业者进入提供了可能性(Lin et al., 2020)。在竞争尤为激烈的个人消费领域, 私有资本几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创业者在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开展有序经营。无论是

以代工、生产为主的新创企业, 还是以品牌、设计为主的新创企业, 都需要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中寻找市场机会。然而, 国有与私有之间的市场转换过程并不是单向的, 在特定时期或环境下国有资本可能挤占私有企业的市场空间。如国家为了发展某个前沿领域而向相关国有企业大量注资时, 私有企业在领域内的生存空间会受到一定影响。这体现了我国市场机制中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之间的交替式、螺旋式演化关系, 即对市场逻辑中“中国特色”的理解应避免“非此即彼”的互斥性思维。

二是我国市场发展中的企业经济组织机制——产业园区。通过产业园区建设有效协调企业、产业、区域等多个层面的经济活动及市场发展。产业园区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区域利用特定政策发展产业和科技的[企业]集聚区”(任浩和甄杰, 2021)。自1979年我国第一个产业园区——深圳蛇口工业区建立以来, 产业园区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发展与组织方式一直是我国经济的重要载体。根据2021年相关数据统计, 仅399个国家级产业园区就贡献了全国GDP的1/5、出口的2/5、税收的1/4(任浩和甄杰, 2021)。各地政府机构以产业园区为依托, 通过将相近行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中到相同的地理空间, 推动形成特色化、集约型区域产业集聚区, 实现产业集聚发展和产业链整合。产业园区建设以地方政府为主导, 由政府部门负责园区规划与运营, 但在产业资源配置和产业链发展上, 却是以纯市场化方式完成的。产业园区建设使新创企业可以围绕大型企业更好地开展资源整合和业务协同, 园区成为要素交换的市场, 进而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很

大程度上说,产业园区建设孕育了创业市场,强化了新创企业经营效率和创新效率(Zhang & Li, 2010),使企业可以按照以效率和利润为战略基础的市场逻辑开展经营。同时,园区经济的空间集聚效应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交易的产生,也有利于产业链利益相关方之间形成合法性认知(陈衍泰等, 2021)。在新创企业培育上,园区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以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为例,园区为处于初创期的企业提供免费办公空间和相应资源支持;待新创企业逐渐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可以根据自身实力决定是承担办公成本以留在园区,还是转移到影响力小但成本更低的周边小园区。因此,产业园区组织模式作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不仅没有影响新创企业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而且孕育了更加有效的市场化空间场所[参见王永进和张国峰(2016)关于产业园区对中小企业效率提升的研究]。

三、制度逻辑与创业研究问题

(一) 制度逻辑变迁与创业

要理解制度变化与创业的关系,首先需要明确制度是如何变化以及制度逻辑呈现出了怎样的动态性特征。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制度设计上必然会比发达国家更加灵活,需要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调整政策、国家规范等(Banalieva et al., 2018)。这种调整不仅频率高速度快,而且很可能幅度较大,在特殊情况下甚至需要完全推翻原有制度设计,通过不断试错和改进推动制度变革。同时,整个制度体系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一种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引起整个

制度体系的调整,进而使不同层级的制度逻辑呈现出动态性特征。

制度要素的变化及其催生的制度逻辑变迁,对创业带来了挑战。例如,前期创业经验是在既往制度框架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对于创业者开展连续创业并不一定具有参考价值;又如,社会和市场变迁使互联网创业者趋向于年轻化。另外,制度环境及制度逻辑变迁中可能孕育出大量创业机会。例如,国家政策由单纯关注经济增长到兼顾生态环境,为环境创业和绿色创业等可持续创业形式提供了契机。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引下,各级部门的制度设计、资源配置开始向包括绿色农业、环境治理、清洁能源等领域倾斜(Gu & Wang, 2022; Zhu et al., 2019),创业者可以在这一情境下开展创业机会识别(李华晶等, 2016)。国家政策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拓展了我国国家制度中有关“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顶层设计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逻辑的合法性来源。中国情境下制度逻辑变迁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影响关系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进一步地,制度逻辑变化可能会促发新创企业的战略变化。新创企业战略设计高度依赖于资源提供方如投资人、地方决策部门等所秉持的制度逻辑(Pahnke et al., 2015),一旦其战略设计偏离了某种制度逻辑,将难以获得所需资源。新创企业战略与我国情境下特定利益相关方制度逻辑的适配性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制度逻辑变迁在影响创业行为与战略的同时,也为新创企业参与制度构建,即制度创业提供了空间。正如主流研究所揭示的,在一些领域或行业逻辑形成、演化的过程中,新创企

业并非旁观者而是重要的参与者 (Santos & Eisenhardt, 2009)。从制度逻辑的角度来说, 创业如何推动制度变革并最终影响制度逻辑变迁, 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近两年内发展迅猛的直播带货为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场景。与一般销售市场仅以交易和盈利为着眼点不同, 直播带货涉及一个涵盖了市场交易、社交互动、情感沟通等诸多方面的综合社区 (王新刚和林荫, 2022)。创业者通过将不同制度要素融合在一起, 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制度情境 (李加鹏等, 2020)。因此, 直播带货所遵从的制度逻辑应该区别于已有其他领域或行业逻辑。如何从制度创业视角去理解我国情境下创业与制度逻辑之间的关系,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 多级行政体系与创业

我国建立的多级行政体系, 是制度逻辑分析中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站在创业管理的角度, 这种多级行政体系构成了创业环境中重要的制度要素。不同层级行政机构的治理方式并非完全相同, 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方式也会存在差异。在一些自治性较强的地区 (如计划单列市、直辖市等), 地方决策部门往往在政策设计、资源配置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种差异性使创业者在遵从地方发展战略、捕捉市场机会等方面可能会面临不一样的挑战。在多级行政体系下, 创业者不仅需要关注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 还需关注与之联系最紧密的决策层级。一方面, 创业者基于正式的地方治理机制与当地决策部门建立联系; 另一方面, 创业者通过非正式联结获取相关资源和政策信息 (Fang et al., 2015),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自身利益诉求整合到地方经济发展策略与规划中。

在多级行政体系下, 创业者需要关注的制度要素可能分散在不同层次。例如, 行业政策设计主要在中央和省级层面, 而创业资源的分配则可能在县市层级。创业者如何在这种跨层次的制度约束与要素分配格局下开展战略设计, 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

由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不同地区之间在政策支持和产业配套上存在较大差异。沿海地区由于成熟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资源配置, 往往更容易吸引创业者, 中西部地区的创业市场发展则相对滞后。然而, 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正在改变这一格局。在国家推行的乡村振兴计划支持下, 中西部地区开始利用自身优势的农业、旅游资源推进创业实践 (雍旻等, 2021)。将创业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联系起来, 不仅符合我国的发展目标和国家逻辑, 而且能够为创业者提供资源和政策支持, 有利于形成个性化的创业资源优势 (Kistruck et al., 2013)。这一现象不仅是有趣的社会创业和制度创业问题, 而且为我们理解新创企业战略提供了很好的场景: 创业者通过将自身能力优势与地方资源优势进行整合、将社会诉求整合到自身商业模式中, 更好地促进新创企业成长。

(三) 多层制度逻辑与创业

从创业的角度来说, 多重制度逻辑影响着创业者行为与决策, 并最终影响创业成败。以家庭逻辑为例, 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家庭这一基本单位对创业者的影响会区别于西方国家 (Xing et al., 2020)。我们一直强调我国社会形态中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 2012), 认为家庭是个人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圈层。创业者早期获取的资源大多源于家庭, 创业中的信任关

系也是以家庭为核心。创业者可能怀揣家庭而非个人的期望和寄托而开始自己的事业，同时以捍卫家族荣誉作为奋斗方向（Xu et al., 2019）。家族或家庭的概念范畴又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一为血缘关系即血亲，二为姓氏关系即宗亲，两者在认知和合法性来源上略有差异。与家庭逻辑存在紧密联系的另一种制度逻辑即宗教价值（religious value）。我国特有的宗教价值与我国社会中的儒家文化息息相关，包括社会和谐、家庭观、非正式社会关系和社会等级（如父子、师生、君臣等）。创业研究可以探索家庭、宗教价值等制度逻辑如何影响创业者的决策制定和战略设计，关注在资源获取之外，宗教价值和家庭逻辑会对创业管理的哪个方面、新创企业的哪个成长阶段以及创业的哪种路径选择（如模式创业还是技术创业）产生影响；在我国南北文化差异背景下，不同地区创业者受宗教价值或家庭逻辑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随着我国社会演进及家庭观念的变化，创业与宗教价值及家庭逻辑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除此之外，从行业或者领域逻辑角度探究我国的创业行为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尽管大多数行业所秉持的逻辑在中西方之间差异不大，但也有很多形成鲜明对比的行业领域，如互联网购物。在很多欧洲国家，互联网购物的发展远不如我国发达，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可能是技术性的也可能是社会性的。有趣的是，我们曾经的学习对象如亚马逊（Amazon）、eBay等，在中国市场难以赢得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我们可以做出一种假设，即这些新兴市场的行业逻辑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为本地企业应对跨国公司的挑战创造了先天优势。分析我国情境下新兴行业的行业逻辑及其对创业行为和战略的影响，有望深化我国情境下的制度逻辑研究。

四、结语

在我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环境下，有关我国企业的制度逻辑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度讨论的课题。数十年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使我国成为独特的制度逻辑研究试验场，针对这一领域的探讨也有望推动制度逻辑理论的发展和深化。一方面，我们看到制度逻辑作为近些年发展的理论视角在解释我们面临的创业行为方面所拥有的强大效力；另一方面，简单地将制度逻辑套用到我国管理与创业研究中势必会遭受适应性问题。创业在我国不仅是简单的经济行为，更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含义，通过创业推动社会进步是当前决策部门的重要战略。基于制度逻辑框架下的创业研究需要考虑到我国特有的社会情境，以及制度体系的结构性和层次性和动态性，在对我国的制度逻辑形成深度理解基础上，探究新创企业的战略设计，分析其资源获取和合法性构建的有效路径。在具体创业问题分析上，研究者需要打开我国制度体系的结构层次，一方面关注不同层次制度逻辑的影响，另一方面考虑各制度逻辑之间的交互作用。在理解制度逻辑的动态变迁上，不仅需要看到不同层面制度逻辑的变化，更应该从系统层面出发，关注单一制度逻辑变化所带来的联动效应，分析各种制度逻辑之间的动态关联性，并基于此探析创业者的行为与战略。

接受编辑：主编团队

收稿日期：2023 年 4 月 7 日

接受日期：2023 年 4 月 28 日

作者简介

郝斌 (Email: binhao@ecust.edu.cn),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工商管理系主任。在同济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 研究兴趣为创业战略与风险投资, 包括新创企业技术创新战略、新创企业合法性获取与创业融资、风险投资战略与 IPO 退出等。研究成果发表于 *Technovation*、*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R&D Management*、*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Scientific Data*、《中国工业经济》和《管理学季刊》等国内外期刊。

参考文献

[1] 陈晋、李卢真、郝斌、马玲：《企业创新信号与政府风险投资——基于制度逻辑视角》，《管理学季刊》，2021 年第 1 期。

[2] 陈衍泰、厉婧、程聪、戎珂：《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组织合法性动态获取研究——以“一带一路”海外园区领军企业为例》，《管理世界》，2021 年第 8 期。

[3] 陈云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经济研究》，2019 年第 1 期。

[4]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5] 胡家勇：《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经济研究》，2016 年第 7 期。

[6] 李华晶、张玉利、汤津彤：《基于伦理与制度交互效应的绿色创业机会开发模型探究》，《管理学季刊》，2016 年第 9 期。

报》，2016 年第 9 期。

[7] 李加鹏、吴蕊、杨德林：《制度与创业研究的融合：历史回顾及未来方向探讨》，《管理世界》，2020 年第 5 期。

[8] 麦克米兰：《市场演进的故事》，中信出版社 2006 年版。

[9] 任浩、甄杰：《园区管理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10] 王新刚、林荫：《直播带货“翻车”的治理机制研究》，《经济管理》，2020 年第 2 期。

[11] 王永进、张国峰：《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经济研究》，2016 年第 7 期。

[12] 雍旻、刘伟、邓睿：《跨越非正式与正式市场间的制度鸿沟——创业支持系统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作用机制研究》，《管理世界》，2021 年第 4 期。

[13] Banalieva, E. R., Cuervo - Cazorra, A., & Sarathy, R. 2018. Dynamics of pro-market institutions and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9 (7): 858-880.

[14] Chen, Q., Ning, B., Pan, Y., & Xiao, J. 2022. Green finance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green insurance in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Article in advance, 39 (3): 899-924.

[15] Chen, X. 2020.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as an identity: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on guanxi behavior.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6 (3): 543-568.

[16] Cheng, C., Yang, X., Jiang, F., & Yang, Z. 2023. How to synergize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firms in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A matching theory perspective.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63 (1): 403-432.

[17] Du, J., & Zhang, Y. 2018. Doe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promote Chinese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47: 189–205.

[18] Fang, R. , Chi, L. , Chen, M. , & Baron, R. A. 2015. Bringing political skill into social networks: Findings from a field study of entrepreneur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2 (2): 175–212.

[19] Genin, A. L. , Tan, J. , & Song, J. 2021. State governa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dissonance in China's high-speed train sec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2 (4): 621–645.

[20] Greve, H. R. , & Zhang, C. M. 2017.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power source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decis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0 (2): 671–694.

[21] Gu, W. , & Wang, J. 2022. Research on index construction of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42: 266–276.

[22] Haveman, H. A. , & Gualtieri, G. 2017.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 He, C. , Lu, J. , & Qian, H. 2019.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2 (3): 563–572.

[24] He, X. , Cui, L. , & Meyer, K. E. 2020. How state and market logics influence firm strategy from within and outside?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nancial intermediary firm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6: 1–28.

[25] Kistruck, G. M. , Sutter, C. J. , Lount Jr, R. B. , & Smith, B. R. 2013. Mitigating principal – agent problems in base – of – the – pyramid markets: An identity spillover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6

(3): 659–682.

[26] Lin, K. J. , Lu, X. , Zhang, J. , & Zheng, Y. 2020.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A review of 40 years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3 (1): 31–55.

[27] Liu, Y. , Zhang, C. , & Jing, R. 2016. Coping with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Temporal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work dur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one foundation in China.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2 (2): 387–416.

[28] Marquis, C. , & Qiao, K. 2020. Waking from Mao's dream: Communist ideological imprint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5 (3): 795–830.

[29] Pahnke, E. C. , Katila, R. , & Eisenhardt, K. M. 2015. Who takes you to the dance? How funding partners influence innovative activity in young fi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0 (4): 596–633.

[30] Redding, G. , & Witt, M. A. 2015. Advancing indigenous management theory: Executive rationale as an institutional logic.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1 (2): 179–203.

[31] Santos, F. M. , & Eisenhardt, K. M. 2009. Constructing markets and shaping boundaries: Entrepreneurial power in nascent field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 (4): 643–671.

[32] Tan, J. , & Wang, L. 2011. MNC strategic responses to ethical pressure: An institutional log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98: 373–390.

[33] Tang, R. W. 2019. FDI expansion speed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rket capitalism: Evidence from Chin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8 (6): 101596.

[34] Thornton, P. H. , Ocasio, W. , & Lounsbury,

M. 2012.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 Xing, Y. , Liu, Y. , & Lattemann, C. 2020.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social enterprises: Entry mode choices of foreign hospitals in Chin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5 (5): 100974.

[36] Xu, D. , Chen, C. , & Wu, X. 2019.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use of non-family executives in family-dominated Chinese listed firms: An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6 (3): 797-820.

[37] Yiu, D. W. , Hoskisson, R. E. , Bruton, G. D. , & Lu, Y. 2014. Dueling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Effect on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8 (3): 195-213.

[38] Zhang, J. , & Luo, X. R. 2013. Dared to care: Organizational vulnerability,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MNCs'

social responsiveness in emerging markets. *Organization Science*, 24 (6): 1742-1764.

[39] Zhang, Y. 2023. Exploring interfirm collaboration processes of small-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35 (3-4): 402-423.

[40] Zhang, Y. , & Li, H. 2010. Innovation search of new ventures in a technology cluster: The role of ties with service intermediar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1 (1): 88-109.

[41] Zhou, K. Z. , Gao, G. Y. , & Zhao, H. 2017. State ownership and firm innovation in China: An integrated view of institutional and efficiency logic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2 (2): 375-404.

[42] Zhu, Q. , Jia, R. , & Lin, X. 2019. Building sustainable circular agriculture in China: Economic viabil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Decision*, 57 (4): 1108 - 1122.

Institutional Logic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Bin Hao

(School of Busines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Institutional logics has been applied to explain Chinese phenomena, yet little has been done to explore how the unique context of China affects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this study, we first review literature on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China and then elaborate on state logic and market logic in China's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s. We propose that the state logic in China's context differs from that in other countries in the sources of legitimacy and identity, basis of attention, and basis of strategy. We also suggest that the uniqueness of the market logic in the Chinese context lies in the "coordinated ordering" of market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configuration,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role of state-owned capital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role of industrial parks in value chain integration. As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this study points to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firms' institutional logics, the multi-leve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resence of multiple societal-level institutional logics.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logics; China; entrepreneurship